

草原文化研究

第一辑
资料选编

主编
副主编

牛森
乔吉

刘蒙林
德力格尔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主 编 牛 森

副主编 乔 吉 德力格尔 刘蒙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1辑/牛森主编·一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6

ISBN 7-5311-5978-3

I. 草… II. 牛…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资料—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177 号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主编/牛森

副主编/乔吉 德力格尔 刘蒙林

责任编辑/孟春 何颖 王辽海 塞树林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印刷/呼和浩特市白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2.125 字数/663 千

版本/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电话/(0471)6961597 邮编/010010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311-5978-3/G · 5480

定价/108.00 元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编委会

主任:牛 森

副主任:乔 吉 德力格尔 晓 克 刘蒙林

委员:牛 森 王辽海 王俊艳 乌云娜 长 命

刘蒙林 乔 吉 托 亚 陈红宇 孟若娴

斯琴高娃 塞树林 德力格尔

序

2004年7月，“草原文化研究工程”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大型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项目设立并启动，这标志着草原文化研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知道，草原文化研究已进行多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为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学、语言、宗教等专题领域，而没有把草原文化当做整体研究对象，特别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源头之一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这种状况，同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与同属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研究现状相比，也明显处于滞后状态。因此，如何对草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已引起有关方面广泛的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同志从2001年以来，就几次明确提出我们内蒙古要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草原文化”，要通过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确立和阐释“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中应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专门成立了由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光林，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国民，自治区副主席乌兰等领导同志负责的“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全面组织实施草原文化研究工程。

“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编辑出版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组织多种形式的研讨和媒体宣传活动，努力形成研究和宣传互动、成果形成和成果推广相衔接的格局；组织系列专题研究，出版多卷本《草原文化研究》丛书向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在各类专题研究基础上，出版多卷本《草原文化史》。

在我们看来，在我国北方地区形成、发展并熠熠生辉的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建构完整的文化体系，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关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讨论和论证。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考古发现等人类早期历史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是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步发展的；甚至在不少领域还走在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前列。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孕育草原文化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曙光升起的地方。

从与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的比较来说，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

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如果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将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从对于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作用来说,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具有蓬勃生机的内在动力之一。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长期交流融汇、互动发展,构成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是我们把草原文化置于中华文化这一整体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研究时必须把握的历史主线。

总之,草原文化并非是单一、简单甚或是“荒蛮”、“粗野”的文化,并非是中华文化中随意可以忽视的边缘文化,而是一种具有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重要文化形态。她与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都是中国大地上各民族人民富有想像力、创造力的伟大成果,都是我们需要继承、弘扬的优秀民族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

“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引起很多方面的关注和好评。许多学者、专家及有关方面人士都认为,深入研究草原文化,阐释其内涵、特征及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种共识与预期,使我们所有参与草原文化研究的同志都甚感欣慰和自豪。

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提,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天,在“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各项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作为工程重点项目之一的《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已开始陆续出版了。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牛森等编委会的同志们,感谢入选《资料选编》文章的作者们。

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料选编》的质量,使之更好地为深入进行草原文化研究提供参考,我们诚恳希望广大学界同仁,为我们提供资料线索,推荐入选文章。我们相信,《资料选编》的出版,对草原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草原文化学科的建设将发挥出长久的作用。

“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团英

2004年12月2日于呼和浩特

目 录

文化理论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苏秉琦(1)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文明(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的格局	
——从红山文化的积石遗存和玉器谈起	孙敬明(15)
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	江林昌(24)
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黄楠森(36)
文化与文明	苏秉琦(42)
“文明”与“文化”	陈炎(48)

史前史研究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苏秉琦(56)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苏秉琦(66)

考古专论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魏坚 崔璇(78)
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	乌恩(97)
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的社会形态	
——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比较研究	[以]吉迪(121)
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	刘东生 吴文祥(138)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时代以来气候、植被变化研究综述	汤卓炜(142)
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	
——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陈星灿(153)

红山·辽西文化

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	杨虎(159)
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	
——赤峰红山考古之一.....	[日]秋山進午(169)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	苏秉琦(191)
论西辽河古文化	
——与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	苏秉琦(196)
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	郭大顺(199)
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	孙守道 郭大顺(208)
西辽河流域早期文明的起源.....	段渝(217)
查海文化与原始文明刍议.....	胡健 李丽新(240)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王惠德(246)

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

中国古代游牧文化的几种类型及其特征.....	贺卫光(257)
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	
——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势的探讨	高翔 刘凤云 (268)
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乌恩(278)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上.....	林沄(284)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下.....	林沄(307)
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初探.....	邵方(320)
从阴山岩画看古代游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	盖山林(330)

华夏源流

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徐亦亭(336)
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	安作璋 王克奇(344)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	李绍连(357)

文化大系研究

红山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

- 两种异质文化并存区域的比较研究 李勤德(368)
红山诸文化与中华文明 薛志强(375)
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 童恩正(383)
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 郎樱(400)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
——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佟柱臣(405)
中华大地上的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 格勒(418)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 欧军(424)
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及其交流 汤晓芳(429)

学术综述

- 缅怀四老,深入开展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苗波(437)
“游牧民族在中央亚文明中的作用”
国际讨论会 [苏]E. И. 冠恰诺夫 Θ. A. 诺甫戈罗多娃(446)
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 郑君雷(453)

文化交流

- 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长城地带对外贝加尔地区的文化影响 冯恩学(466)
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 史继忠(476)
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贾合甫 · 米尔扎汗(486)
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 [苏]С. И. 鲁金科(494)

后记 (503)

文化理论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苏秉琦

文明史提前一千年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 100 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 4000 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就有了 5000 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 1000 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 841 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4000 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白胡子，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可是，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范（模子），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个独有特点，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别个所没有的。

总之，灿烂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

为什么至今才找到五千年的证据？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也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关联。

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而中国考古学作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却只有 60 多年的历史。

1920 年，北京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第一次发现了仰韶文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从那以后，他用 17 年的时间探寻这一文明的起源。我国一批考古学前辈也为此做了不懈奋斗。

建国前近 30 年中，中国考古学初步揭开了旧史书有关古代传说的神秘面目，显示出从原始社会至阶级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的轨道。建国近 40 年来，考古事业得到了大发展，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 7000 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 100 处以上，取得了新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大量考古成果。

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做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做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这一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中华辽阔国土上古代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真相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划分，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怎样发现的？

1979 年 5 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之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 5000 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看来,距今 4000 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它的文化特征是:聚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由一串小城堡组成的群体恰恰分布在战国秦汉时代古长城线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始长城”?由此,也可以对秦长城性质得出新的认识,长城除了防御外,也有个标志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当时的北疆。

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何在?

辽西考古这项新发现之所以特别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亿万华人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它们明确无误地属于一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分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的遗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遗址中却还未发现过类似的遗迹。第二,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揭露的几处所谓“积石冢”,确切地说,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主要用做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时又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场所,它们普遍保留下来的与东山嘴那处祭坛颇相近的遗迹遗物就是明证。第三,在同一范围内发现的 6 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成一线,达几十公里,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女神庙近旁发现的冶铜址同样说明这一地段的特殊性。

从 1979 年最初发现东山嘴祭坛,到 1983 年经过第一次论证会后所获一系列重要发现,其间经过了八九年时间,目前工作还在继续中,资料的积累消化要有一个长期过程,问题的研究认识也要逐步深入,对“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的小三角范围内已揭露的重要遗迹现象的进一步工作与研究,没有三五年时间不成。我曾把这项工作比做一条牛,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仅只是有如牵住牛鼻子,最多不过是看到牛的头部,整个牛身还在后边。全牛的形体大致包括从辽西走廊的医巫闾山以西到七老图山以东,中间是努鲁尔虎山,三县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面形。地理范围:东侧是大凌河流域的阜新、朝阳两市;西侧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昭盟)。1987 年在敖汉旗揭露的同一时期“城堡型”遗址,呈“凸”字形,总面积 3 万余平方米。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如果说“小三角”的坛庙冢的发现可称做文明的曙光,谜底的揭露也为期不远了。

要回答这问题还应向更深、更广的时空范围进行开掘。

第一个层次:在上述空间,即一条山梁(努鲁尔虎山)、两条河流(大凌河、老哈河)和三个地、市(朝阳、阜新、赤峰)范围内,远自前红山文化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约距今 8000 年至距今 6000 年)下至秦汉统一前的燕文化(公元前一千年代),过去我们曾把这一带远古文化用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与富河)、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

加以概括。实际上,现在越来越清楚,这提法还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论是从中国民族文化体系基础结构的形成,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绵不断这两种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观察,这里给我们的启发太多、太重要了。专讲些有关龙类形象的出现与发展吧。

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猪龙具有很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而在它之前千余年前赵宝沟——小山类型文化中已有长期发展历史,并已出现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画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遨游的图案。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燕下都出的大量所谓“饕餮纹”瓦当,似乎使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从殷周文化承袭而来的。道理也简单,燕式鬲既然可以追溯到相当夏商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饕餮纹瓦当为什么不可以是源于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

由此可见,远自距今约 8000 年以来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到距今约 2000 余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燕山南北地区,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使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国如何形成和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

第二个层次:把上述空间(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即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连接起来,进行横向研究,从宏观角度就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在此范围内(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近十来年内许多重要发现几乎是和辽西这一新发现同步展开的。其中有些重点工作(如冀西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两地 1979~1982 年间的发掘)是特为追踪两者的中间环节而进行的。到 1985 年初告一段落,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点,又以晋文化考古为题,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为了扼要地向参加晋文化讨论会的朋友们介绍这个总概念,当时画了一张示意图,用“Y”字形示意图标明几处重要地点。还诌了四句七言诗,烦张政烺教授即席篆写悬挂墙上,作为讲话提纲,现抄录如下: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讲话落脚点自然是晋文化渊源。论证的核心部分正是依据辽西新发现,这就在更高层次上阐述了对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新认识。

“华山玫瑰”:指的是源于华山脚下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它的一部分重要特征是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

“燕山龙”:指的是燕山北侧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龙(或鳞)纹图案陶器(或玉器)。

仰韶文化的关中一个直根系统曾经历过两次裂变。第一次分化出一个以壶(罐)形口尖底瓶和鱼纹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征的支系;第二次分化出一个以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征的支系。

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身则曾有两个支系:其一是产生“之”字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其一是产生“篦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二者曾经先后两次发生聚变产生两个新的支系:其一是以包含刻画麟(麒麟)和龙纹罐为其突出特征;其一是以包含鳞纹彩陶罐为其突出特征。

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在各自第二次演化(聚变或裂变)出的两个支系距今约五六千年间在冀西北桑干河上游交错相会。这就是辽西新发现红山文化坛庙冢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后者正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这也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对辽西新发现意义的认识。以上是对第一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解释,也是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论点的依据。

“大青山下斝与瓮”以下三句是什么意思呢?

从距今 5000 年左右到距今 2500 年左右期间,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既有大致同步发展的一面,又有类似的错综复杂难于梳理的一面。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二者实有微妙的差异。特别是在我们前边所讲的大“Y”字形的北方——中原联结地带。这就是后三句的全部含意。

紧接红山文化末期的辽西地带,大凌河流域材料贫乏,老哈河流域发现两处颇具时代和地方特征的遗址(赤峰的大南沟墓地和敖汉旗的小河沿)自成一个亚区系。辽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带(伊盟、乌盟间)加上“三北”(冀西北、晋北、陕北)中间隔着锡盟这块中间地带。后边这个地带正是黄河的几个支流(混河等)、桑干河、滹沱河与汾河的发源地或上游。这一地带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亚区系。由此往南,直至晋南的曲沃——夏县一带,晋中(太原附近)是它和前者的中间地带,形成第三个亚区系。

把这三个亚区系连成一片,和中原同时期对比,上下两千几百年间,确有若干衔接环节是中原地区所难于理解的。例如:

——伊盟准格尔旗发现晚期小口尖底瓶(从绳纹过渡到篮纹)与早期斝类(从绳纹过渡到篮纹)并行迹象;

——赤峰、敖汉两地发现的彩陶与彩绘黑皮陶衔接迹象，鳞纹过渡到原始雷纹迹象。红山文化“之”字纹压印纹后期形成的“类篮纹”与真正拍印篮纹衔接迹象；

——从尖腹底斝经过斝鬲（过渡型）到真正由三袋足拼接而成“腹足不分”的鬲的全过程；

——“真鬲”出现后，经过约千余年间演化过程，直到西周初期这一带还保留着自己传统特征，腹与袋足间留有清晰界线。

这不仅说明晋文化有其自身传统历史背景，还说明这条北方——中原连接地带既有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性质，又具有比中原相对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特色。秦汉统一前的几千年如此，秦汉统一后的两千年更为明显。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永远会给我们以启迪，从野蛮到文明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又是我国各族人民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历史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条，要从我国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第二条，要目的明确，为了我们的明天，更为了我们的今天社会需要；第三条，要方法对头，只有应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回答中国历史的辩证法发展，只有它才会真正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愿与同行及一切朋友们共勉之！

（原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严文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看似距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许多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想了解个究竟。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的研究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比过去远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还有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

大凡关心当代社会发展的人,莫不深感西方文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相形之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却获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和比较健康的社会进步。人们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大不相同,几乎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用的东西,创造性地解决自己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问题。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它是那样博大精深,不但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过去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今天经过适当的调整,在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伟大文明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当然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研究。而追溯这样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当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从信古、疑古到考古

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但这个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毕竟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后来的人也就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曰信古。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他们怀疑被儒家捧为圣人的尧、舜、禹等是否真有其

人,是否真的实行过什么禅让制度。这样一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似乎要大幅度向后拉了。这些学者被称为疑古派,在一段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人们既不能盲目的相信历史著作中的每一件事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怀疑、辨伪的阶段上,而需要寻求一种探索古代历史乃至史前史的科学基础。这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实物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这种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是从 1921 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史前遗址而开始的;但作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组织的考古研究工作,则是从 1928 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发掘开始的。

因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对研究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途径。下面的时间表很可以说明考古学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

1928 年至 1937 年,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墓群,还有大量的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甲骨文窖藏,从而证明殷墟是自盘庚迁殷直至纣王灭国,历时 273 年之久的商代晚期都城。由于这一发现,学术界才普遍接受中国文明至少应追溯到商代晚期。

1955 年,在河南省郑州首先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遗迹,其后经过 20 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那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址略呈方形,周长约 7 公里。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城外则有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人们相信,中国文明至少要提前到商代早期。

1959 年,为着寻找夏墟,曾对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往后又经过多年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不少学者认为那应该是夏代的一个都城,于是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正是按照考古发现的时间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的。最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还要往前推:“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因为“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96 页,文物出版社,1985 年)。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下面,我想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稍稍梳理一下,看看我们“野蛮”的祖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走向文明的脚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 10000 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